

道教養生治國安天下的開山巨著

楊寄林 譯注

對歷史的王朝嬗遞、社會變遷與中華民族的心理結構

風俗習慣乃至家庭生活方式的產生與其他宗教所不可替代

的重大影響又對封建時代的哲學思想、倫理學說、文學藝

術以及地理學、養醫藥學、化學的發展做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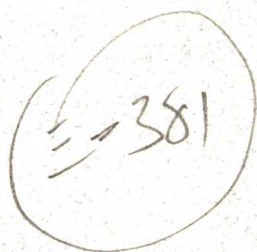
太平經

今注今譯

河北人民出版社

B951
Y203
1

杨寄林
译注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504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太平经今注今译/杨寄林译注.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2.4

ISBN 7-202-02871-9

I. 太… II. 杨… III. ①太平经-译文②太平经-注释 IV. B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5681 号

书 名	太平经今注今译 (上、下)	
译 注	杨寄林	
责任编辑	张 琦	
美术编辑	李 欣	
封面设计	宋丕胜	
责任校对	张三铁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1.75	
字 数	1322000	
版 次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7-202-02871-9/B·150	
定 价	11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道教养生治国安天下的开山巨著

——
太平经综论

七十四年前，鲁迅先生即在《而已集·小杂感》中独具只眼地指出：“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由道士创立和传播的道教，属于中国本位宗教。它从东汉后期正式形成之日起，历经孳乳繁衍，以其奉“道”崇“德”、重生贵生、长存登仙、扬善止恶、趋吉避凶、开劫度人等教理教义和相应的诸种修炼方术及科仪，径与儒学、佛教鼎足而立，并称“三教”，成为华夏传统文化的支柱之一。惟其土生土长，具有独树一帜的文化体系，非仅不绝如缕地吸纳了大量的民间信徒，而且得到了诸如北魏太武帝、唐玄宗、唐武宗、宋真宗、宋徽宗、成吉思汗、明世宗等封建帝王的极度尊崇和许多公卿士大夫的虔诚膜拜；更为重要的是：既对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嬗递、社会变迁与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风俗习惯乃至家庭生活方式，都产生了其他宗教所不可替代的重大影响；又对封建时代的哲学思想、伦理学说、文学艺术以及天文学、地理学、养生学、医药学、化学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时至今日，道教依然存在，在爱国活动、民俗事象、养生

2 太平经今注今译

健身、旅游资源利用和对外交往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而所有这一切，认真地追溯起来，均与《太平经》结有不解之缘。

一、《太平经》的编著过程与流传情形

《太平经》是中国思想文化史和宗教史上真正映现出道教特质与特色的第一部原始经典。这部经典在道教图籍传统的三洞四辅即“洞真、洞玄、洞神”和“太清、太平、太玄、正一”凡七部的分类体系中，既为太平部的弁冕之作，又为周秦诸子群书之外的最古著述。验之于原经，编著者自以《太平经》名其书，又谓之为“洞极天地阴阳之经”、“洞极之经”、“大乐之经”或“皇天洞极政事之文”、“大洞极天之政事”、“天之洞极正道”、“止奸伪兴天地道之书”。在《后汉书·襄楷传》中，又号《太平清领书》。先于或晚于本传的诸家载录，或称《神书》、《甲乙经》，或称《太平青领道》、《太平青道》、《太平青箓书》，或称《太平道经》、《太平真经》。卷数则大多为一百七十卷；也有载作五十卷、百余卷、七十卷的，依次见于两晋葛洪《抱朴子·遐览篇》、东晋虞喜《志林》及晋宋之际《洞仙传》、北宋初期官修《太平御览》所引《像天地品》，此盖本经的不同传本。另外尚有五斗米道（天师道）的创立者张陵所奉持的一百四十四卷本《太平洞极经》。此经已佚，但据唐初孟安排《道教义枢·七部义》及北宋张君房《云笈七籤》卷六所载和当代已故著名道教学者陈撄宁先生的考证，它与《太平经》俱言“盛明治道、证果修因、禁忌众术”，内容基本一致，当属一经二名；纵为两书，后者也把前者合并在内并加

以融化了。

1. 《太平经》的应运而出

自《太平经》撰成行世后，道教才得以诞生，而这决非出于偶然。质言之，它是三历乱世、杂采九流百术的最终产物。西汉元帝、成帝、哀帝、平帝时期（前48～公元5年），刘氏王朝由衰落走向崩溃。在这五十三年中，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赋税徭役日益沉重，自然灾害有加无已，奴婢和流民的数量恶性膨胀，武装暴动此起彼伏，刑罚越发严酷苛刻，宦官得到重用，外戚把持朝政，在中央权力大为削弱的同时，各级官僚又贪残成风，天下民众陷入了“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得”的境地（详见《汉书·鲍宣传》）。王莽代汉、建立“新”朝后，托古改制，但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土地和奴婢这两个当时最主要的社会矛盾的焦点问题，反而引起了更大的混乱。随着对匈奴、西域、东方高句丽、西南句町国的侵略战争的频繁发动，更把人民推入了绝境，于是绿林、赤眉大起义终于爆发。在起义的漫天烽火中，西汉宗室刘秀攫取了胜利果实，建立起东汉政权。迨至和帝、安帝、顺帝、桓帝时期（公元89～167年），整个社会的状况又出现了与西汉后期、新莽末叶非常惊人的相似之处，而太后接连临朝称制，帝王陆续失子断嗣，又是前所未有的；外戚与宦官两大集团迭相专权，误国殃民，更是变本加厉的；地方豪强势力扩张，农民人身依附加强，动辄丧失生路，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凡此种种，使东汉政权坐在大规模农民战争一触即发的火山口上，处于行将覆灭的前夜。上述三度乱世的纷至沓来，递次把如何避难度厄的人生大事摆到了人们尤其是下层民众的面前，也向思想界和知识层提

4 太平经今注今译

出了如何挽救社会危机的严峻课题。而方士和道流作为知识层的一翼，同样著书立说，径予解答，于是《太平经》便应运而生，随之道教实体——五斗米道和张角组建的太平道也以贫民庇护所的面貌先后出现。

如果说汉代的三度乱世为《太平经》及道教的产生提供了温床，那么，统治者所奉行的思想文化政策又为它们的问世添加了催化剂。在西汉初期，统治者崇黄老而兼用诸子；自汉武帝时起，尊儒术而罢黜百家；由成、哀历王莽以迄东汉桓、灵，重谶纬而道、佛兼容（通常认为佛教自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开始传入中国内地）。在这三次思想文化政策的转变中，由董仲舒创立阴阳五行化的新儒学始作其俑，神学说教愈益盛行，朝野上下趋之若鹜。即如汉初所崇尚的以清静无为为宗旨的黄老学说，到桓帝时也蜕变为神化老子、宣扬修道养寿的黄老道而成为道教的来源之一了（另一来源为战国后期至秦汉的方仙道，即所谓神仙家）。正是统治者对宗教化的神学采取利用、纵容与确认的政策，《太平经》才得以在由这种政策造成的神学弥漫的思想文化氛围中破土而出，历时一百八十年左右始告完成（详下所述），其间且有一次得荐朝廷和两番献书之举。

2. 从十二卷蓝本到一百七十卷大经

据《汉书·李寻传》记载，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打着“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的旗号，倡言重新受命说，即“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私下向弟子夏贺良等人传授，结果被加上“假鬼神罔上惑众”的罪名关入监狱，经审讯而服罪，未做判决时即病死牢中，夏贺良等人也按不敬罪受到惩罚。事后，他

们继续私相传授。到哀帝即位时，甘氏书便由凭借明儒经、通灾异当上司隶校尉的解光特意奏呈给朝廷，夏贺良等人也经黄门侍郎李寻的推荐而待诏黄门，得到哀帝的多次召见。召见中遂陈说“汉历中衰，当更受命”的主张，并提出改年号、易帝号、变一日百刻为一百二十刻的具体办法，还做出了“延年益寿、皇子生、灾异息”、“永安国家”的保证。哀帝于是付诸施行，布告天下，改建平二年（公元5年）为太初元年，自号“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一百二十刻为标准。这番“更受命”的举措时值当年六月，但过一个多月后，杳无效验，哀帝便收回成命，并将夏贺良等人全部处死。解光、李寻也减死一等，被流放到敦煌郡。

由解光特意奏呈给朝廷的《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从《汉书·李寻传》的记载来看，主要是托名“赤精子”造作符谶，宣扬汉当火德，亟须应天命，改制度，化解灾异谴告，实现天下太平和帝王长寿有嗣，这显然构成了战国秦汉以来的阴阳家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董仲舒的三统论、方士的神仙说、天文乐律家的太平义、儒家谶纬学的混合体，由此并从书名上成为《太平经》的蓝本和前身。

甘忠可及其弟子夏贺良等人虽在成、哀之际先后身死，但其书并未因人而迅即亡佚，仍在秘密流传，并被信徒们不断加以扩充和修正。今存《太平经》丁部五至十三中便强调一日计时要以“百刻为期”，极力反对一百二十刻的制度，而此制继哀帝之后曾被王莽所行用，可见在新朝，《太平经》也没有停止过撰集活动。似此延续到东汉顺帝时，乃有琅琊（今山东胶南县西南）人宫崇来到京师洛阳，特向朝廷献呈据说是其师干吉（亦为琅琊人）“于曲阳泉（位于今江苏连云港西南境内）

6 太平经今注今译

水上所得神书”——《太平清领书》一百七十卷，但被政府主管部门认为“妖妄不经”，仅予收藏。逮至桓帝时，又有隰阴（今山东临邑县西）人襄楷复献此书（详见《后汉书》本传）。这就是至今仍能见其基本内容的《太平经》。

3. 成书的绝对年代

《太平经》既有两番献呈之举，则其完整传本非一，固无可疑；而首次献呈之时又必为业已成书之日，亦属常理。但据今本《太平经》所言，这一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本经卷一百二《神人自序出书图服色诀》称：“乙巳而出，以付邮客而往通之者也。”卷一百十二《不忘诫长得福诀》又谓：“书当未用，帝王未信也。佞者在侧，书不见理也。太平之书，三甲子乃复见理。”三甲子即一百八十年，在这一百八十年内，只有西汉成帝在位期间逢遇乙巳年即永始元年（前16年），东汉顺帝在位期间根本就不存在乙巳年，乙巳年到东汉桓帝在位期间才又第三次轮到，即延熹八年（165年）。据此推断，《汉书·李寻传》漫载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其具体时间应在永始元年，下距哀帝上演“再受命”的闹剧为十年，自与事理不悖，也与劾奏甘氏的中垒校尉刘向仍在世相合（刘向卒于成帝绥和二年即公元前7年）。若谓“乙巳而出”恐系甘氏之书的遗文，非仅本《诀》卷数已经逾百，其通篇内容更同甘氏之说相涉甚远，自难成立。既云“佞者在侧，书不见理”，这显然是在献呈却遭弃置后方会发出的慨叹语。如此看来，乙巳实指桓帝延熹八年而言。此年桓帝派遣中常侍到陈国苦县祠祀老子，次年又在京师濯龙宫亲祠老子，而《后汉书·襄楷传》称其于延熹九年诣阙连上两道奏疏，在第一道奏疏中明言“臣前

上琅琊宫崇受干吉神书，不合明听”，则此“前”字，毋乃亦谓延熹八年。正是桓帝的祠老举动，才直接诱发并促成了襄楷献经上疏的行动。总之，以《襄楷传》同本经两《诀》经文所述相印证，《太平经》成书的绝对年代当在延熹八年，而非顺帝时期。退一步讲，顺帝时期纵已成书，且为一百七十卷之巨，到延熹八年卷数依然如旧，也有后人包括襄楷所增益的文字，即所谓“复见理”。襄楷献经，推尊前代术士，不言自家有所染指，纯系汉代献书人的惯用手法。以宫崇视干吉，亦复如是。后来汉灵帝“以楷书为然”，就是很明白这一点的。

4. 主要编著者与思想渊源

从甘忠可、夏贺良等人直到干吉、宫崇、襄楷，就已经表明《太平经》决非一时一人之作，而经中又有多处自相矛盾的说法，更因成于众手所致。众手之中，干吉或称于吉，宫崇又作宫嵩，均系同人异名，二人确是早期较著名的道士，殆为本经的主要编著者。襄楷则属方士化的儒生，甘、夏等人身为方士灼然可见，但也不乏和襄楷同类的人物，如当时担任长安令的郭昌。他们尽管身份不完全相同，然而几乎全是齐地人。不言而喻，齐地是以精气说、阴阳五行说和神仙说为骨架的传统齐学的发源地，因而《太平经》也崭露出当时齐学所代表的地域文化的本质特征。

如同任何一种文化愈具民族性也就愈具世界性一样，《太平经》愈具地域性，也就愈具全民性。但它虽然脱胎于甘氏之书，却从更大的范围内对前代和当代有助于构成自家思想理论体系的观点、主张和杂语广加搜采，尽行融汇，用编著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拘校纵贯上古、中古、下古，横包“天经、地

8 太平经今注今译

经、人经”的“众文诸书”以及民间男女老少的“口辞诀事”，勒成洞极之经。惟其如此，除前面已提到的各种学说外，诸如古代以天神、地祇、人鬼为系统的鬼神思想和祭仪，用种种神秘的手段祈福禳灾的巫术，专门决疑难、断吉凶的占卜遗法尤其是汉代《周易》象数学，医药卫生及体育知识，先秦道家的道论与长生久视之说，儒家的仁论和忠孝敬顺伦理观，墨家的反映下层民众利益的某些主张等，都被包纳进来。这在今本《太平经》中仍是历历可以考见的。

5. 编著者对书名涵义的原始解释

《太平经》作为汉代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给该时期的社会思潮注入了新的内涵。经中对何以名此书为《太平经》，曾有七八处说明，或从功效着眼，或从表现出发，或从寓意切入，其中最为完整的解释是：“‘太’者，大也，天也，天能覆育万物，其功最大。‘平’者，地也，地平，然能养育万物。‘经’者，常也。天以日月五星为经，地以岳渎山川为经，天地失常道，即万物悉受灾。帝王上法皇天，下法后地，中法经纬星辰岳渎，育养万物，故曰大顺之道。”（见本书第1697页，下有较长引文，均注页数。）这段解释强调帝王要如天之大，似地之平，恪守并绝对顺适天生地养的常道，实现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的极大的既顺且平的状态。在这里，“太平经”其实犹言“太平道”，而“太平道，其文约，其国富，天之命，身之宝。近在胸心，周流天下。此文行之，国可安，家可富”（1621页），又从国安家富上点明了“太平”的底蕴所在。

有关太平之义，《庄子·天道》说是：“知谋不用，必归其天，此之谓太平，治之至也。”（自清王夫之以下，学者多谓此四句

前后凡 637 字属于伪作掺入《天道篇》。)《孟子·离娄上》设定为：“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思想上与思孟学派具有较密切联系的战国阴阳家中专治音乐者在《吕氏春秋·大乐篇》中又这样做表述：“天下太平，万物安宁”；《汉书艺文志·数术略·天文类》所著录的托名黄帝的汉以前典籍《泰阶六符》转而宣明：“三阶平则阴阳和（三阶即三台星，每台二星，凡六星。《太平经》中也有三台“辅正天威”和“有解三台，正为太平”的话），风雨时，社稷神祇咸获其宜，天下大安，是为太平。”（《汉书·东方朔传》应劭注引）此类太平义到了本经编著者的手中，已被提升到太平道的高度上来了。其间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关于汉武帝欲“建太平之道”的说法，或对本经编著者也有启发。《诗序》所谓“太平君子至诚”（《南有嘉鱼》），《尔雅·释地》“太平之人仁”等，均在经中有所体现。

6. 编著者对书有三等的层次区定

经既名曰《太平》，对其内容层次，编著者亦以太平道为进退，径予宣明，即：“书有三等”，“一曰神道书，二曰核事文，三曰去浮华记，都曰大顺之道。”“所谓神道书者，本根与阴阳合，与神明同（此二句《云笈七籤》卷六《四辅》引作“精一不离，实守本根，与阴阳合，与神同门”）。核事文者，考核异同（此句中“考核”《云笈七籤》引作“核事”），疑误不失。浮华记者，离本已远，乃居野，其文错乱，不可常用，时可记也。”（24、1696~1697、1700 页）

在这里，“书有三等”之“书”，专指本经而言，并非泛称世间著述。神道书云云，乃谓经中对守元气、奉天地、顺五行、驭神灵等根本道法所作的通盘阐述，它们构成了全经的理

论支柱和最高层次。“神道”盖袭自《易·观·彖》：“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其义则为灵验如神之道。

核事文云云，乃谓经中对诸多事象、事类所作的统贯古今又究洽内外的辨析与验定。此等辨析与验定，“一字适遗一字起”（432页），“正取一字如一竟”（405页），得其意，返其本，使一切疑惑和所有谬误均迎刃而解，一扫而空。它们构成了全经的烘托性的正面展开部分和中间层次。

浮华记云云，乃谓经中所排斥、抨击和弃除的对象，即在编著者看来纯属“孤说偏辞”或“功邪淫法”的其他学派的学说或方术。由于这些学说或方术为害甚巨，故须“去”之。所“去”的具体内容也就构成了全经的陪衬性的反面展开部分和初级层次。

上列三等书文，是编著者按照“守本戒中弃末”的准则区定出来的，从整体上表明了本经的内容结构层次。既阐明神道，又核定凡事，复去浮华，便“都曰（统称）大顺之道”。大顺之道即太平之道，为此经中又盛言：天使世人“弃浮华文，各守真实，保其一”（156页）；号召道徒和学者“疾弃浮华，能务核事”而“求真道”（809页）。求真道的步骤在拜随天师学道的真人那里也说得很清楚：首则“司（伺）问小事外浮华也”；继则“见天师说而无极，故敢问身宁可得长存与不（否）”；嗣则“见天师说而无极，故敢问小政事”；终则“见师说无极，乃敢具问天地开辟以来，帝王更相承负愁苦，天灾变怪讫不绝，何以除之？又群神无故共害人，人不得竟其年命，以何止之？”（1073页）这番自述，适从学道和授道的程序上反过来证明了本经“书有三等”的内容结构层次。

7. 编著者对部帙卷数的专门说明

围绕太平道，本经还特辟专篇《经文部数所应诀》（凡两见），申说全书部帙卷数划分、厘定的理据。由于天数起于一，终于十，十乃“十干之始，五行之本”，故分全经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部；数至百则毕备，而北斗星斗柄往来旋转七位，又显示着“阴阳建破”的交替循环过程，故定全经为一百七十卷。如此“象天地为数，应阴阳为法，顺四时五行以为行”，“随天斗所指以明事”，适可“除恶致善消灾害”（1086、1663~1664页）。本经之所以又称《甲乙经》，即源于这种部帙划分区定法。

8. 编著者对书写装帧形式的特意标揭

同样紧扣太平道，经中亦设专篇《神书青下丹目诀》（据《敦煌目录》，共两篇，首篇则称《书用丹青诀》），标揭全经在装帧设计和书写形式上的特点与用意：“吾书中善者，悉使青首而丹目”，这正昭示着“吾道乃丹青之信也。青者生，仁而有正；赤者太阳，天之正色也。吾道太阳仁政之道，不欲伤害”（1489~1490、516页）。太阳特指最为旺盛的阳气，流布在南方与夏季，属火行，主养。青为少阳即不太旺盛的阳气的气色，流布在东方与春季，同“仁”俱属木行，主生。此处所谓太阳仁政之道，依然是对天生地养的永恒常道的再凸现。将经文所言同《后汉书·襄楷传》及诸家著录之语相勘合，表明本经乃系帛书写本，帛取月白色，上面打有红色直格，以青绢包头，略如现今书画卷的护首，用红笔来写标题，即“皆缥白素、朱介（界）、青首、朱目”。这种写本从书写材料的择用到

装帧和版式的设计，都非常考究，也相当精美，闪跃出原始道教的特有格调与神髓。若以顺帝时成书论，上距蔡伦造纸至少已有三四十年，但编著者仍按当时凡重要文书则继续使用竹帛的惯例，特取昂贵的月白色缣帛写经，委实突出了本书作为“太平经道”的独特地位。它又被冠以“清领书”、“青领道”、“青道”、“青篆书”等名号，恰恰由其装帧形式而来。

9. 篇目组成与文体类型

为了宣示太平道，本经编著者在十部一百七十卷的既定框架内，撰就经文三百六十六篇，逐篇标列其篇数次第，这显然是仿照全年天数而厝置的。以敦煌石窟发现的手抄《太平经》残卷所列总目录同今本《太平经》及《太平经钞》相参照，可以确定实存完整篇目三百六十三篇，缺漏三篇（缺癸部卷一百五十六第三百三十二篇，又己部卷九十四“肠决第百四十六”、癸部卷一百六十一“诀三百五十一”，文有漏抄处，不明所云）。在实存的三百六十三篇中，以“法”、“诀（决）”为大宗，依次为八十篇、二百二十五篇，分别占全书的21%、60%略强；其次为“戒（诫）”，共计二十一篇；再次为“文”、“图”，各计五篇；复次为“复文”与“敕”，各计四篇；此外尚有《两手策字要记》、《人君急记》、《天君教有仙相不须邪鬼诫难》、《事关天上三万六千天戒决》、《得道长存篇》、《师明经图传集》各一篇，以及不缀文体字样的经文十三篇，如庚部《音声舞曲吉凶》、辛部《行正》和《不死禄厚见吾文》、癸部《治土病人》、《众官皆精光所生》等。

从各篇所论列的具体内容或字面意思来看，“法”侧重在太平道的原理、准则、定律、行事规范的阐发上，但也谈

“术”；“诀（决）”则主要针对与太平道相应合特别是相违逆的东西以及处于疑似之间的各方面的问题做出裁决，得出定论，归于“真道正术”；“戒”是对修道施术的重大事项指点迷津，对恶行劣迹予以当头棒喝；“文”是需要加以重点述说的文字，含有极力彰显的意味；“敕”是借至高天神之口发布的命令，具有人间帝王诏书的性质；“要记”或“记”，特就紧切事由而发，带有疏解的成分；“戒难”，旨在对戒的认识进行究诘辩驳；“戒决”，意在对戒的紧要性严加剖判和强调；“集”和“难”相近似，系环绕特定的问题集中而又全面地做辨析。至于“某某篇”或不用文体字眼而径标具体辞语者，则袭用撰文中据义名篇的通行做法，并无深意。当然，本经“法”也好，“诀”也好，“戒”和其他文体也好，各自的区分仅仅是相对的，其实在内容表现上往往是交参互涵的。本为同一种主张或同一宗事体，通过分设文体不同的专篇展开论说或在文体歧异的诸篇内屡予言及，这在经中也颇有例证可援。编著者曾着重强调说：“卷投一善方，始善养性之术于书卷，下使众贤诵读，此当为洞极之经竟者”（785页），这才是实质所在。本经基于更简明地阐扬太平道的需要，还在每篇或两篇篇末例附篇旨概括语，也有在整卷卷尾总括数篇大意者，既与篇题前后呼应，又对全文构成强化的功能。其中几乎全是撮述怎样“平复王政”之类的措辞，带有异常浓烈的政治色彩。

10. 表述方式的独到之处

通观各篇，大都采用天师答六方真人问的对话体，也不乏直述体或韵语。韵语或为隐语型的，如《师策文》；或为四言、七言、杂言式的，如《八卦还精念文》等；或单独成篇，如